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语言教育战略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沈 骑

中国英汉双语教育研究 ——现状与规划

朱 晔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语言教育规划研究”，课题号：
重大项目“国家利益视野下的语言教育战略发展研究”，课题号：
国语大学校级重大课题“语言教育战略发展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本研究获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资助。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语言教育战略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沈 骑

中国英汉双语教育研究 ——现状与规划

朱 晔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英汉双语教育研究——现状与规划/朱晔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8
(语言教育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1759-2

I. 中… II. 朱… III. 英语-双语教学-教学研究-中国 IV. 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2306 号

中国英汉双语教育研究——现状与规划

朱 晔 著

责任编辑/郑梅侠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02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759-2/H · 2540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reface

James W. Tollefs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he new series edited by Professor Shen Qi examines the most important area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LPP): language policies in education. Since LPP emerged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focus of LPP research ha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its initial limited concern with corpus and status planning in developing nations to a broader range of status, corpus, and acquisition planning issues in all contexts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language varieties. Because multilingualism and systematic language variation are present in virtually all contexts worldwide, from large-scale social systems such as nation-states to the micro-level daily interactions in classrooms, households, workplaces, and other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LPP has come to be seen as pervasive in all social settings and a central concer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mong the wide range of LPP contexts deserving researchers' attention, it is arguably the case that no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ducation. In the increasingly plurilingual world

under globalization, schools everywhere are characterized by intense attention to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deed, one cannot conceive of curriculum policy, textbook and materials design, assessment,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s of classrooms,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programs for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nd the arcane details of budgets and funding unless one seriously considers language education issues.

Although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are thus inevitably important around the world, there remains wide variation in the processes of policymaking, the goals and the systems for implementing polic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and other areas of social policy and planning.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hat LPP research adop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hat seeks to discover the commonalities and the variability i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different contexts. Policies that may be effective in one setting may not work elsewhere, and so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must develop a broad perspective that can only come from serious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a variety of educational context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is new series of books o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East Asia, Europe, Africa,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promises to be valuable for all LPP scholars.

Under the editorial leadership of Professor Shen Qi, this new series can also fill an additional gap in LPP scholarship,

namely the limited research o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conducted by scholars in Chinese-speaking areas of the wor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well trained LPP scholars in China and China's growing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LPP in education, this series of books promises to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hat is led by researchers based in China, and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in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总序(中文版)^①

沈骑教授主编的这套新丛书探讨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LPP)中最重要的领域:语言教育政策。自LPP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以来,其关注的范围逐渐扩大,从最初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本体和地位规划到所有多语社会中的语言地位、本体和习得规划问题。多语现象及系统性的语言变异几乎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各个语境,从宏观层面如民族国家到微观层面上的课堂、家庭、工作场所和其他公共或私人空间的日常交流,因此,LPP被认为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情境中,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备受关注的LPP众多研究领域中,教育可谓是最重要的领域。全球化使世界变得日益多语化,对语言教学的极大关注已成为学校的普遍特征。事实上,在对诸如课程规划、教材及教学资料设计、课程评估、课堂组织方式、教师及行政人员的专业教育以及教育经费预算和资助等细节问题的理解方面,都必须建立在对语言教育问题的深刻思考上。

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国际普遍认同,但世界各地在政策制定的过程、实施政策的组织及其目标、语言教育政策与社会政策和规划的其他领域的关系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

① 序言中文版译者:李怀(上海外国语大学)

LPP 研究中采取比较法来探究不同语境中语言教育政策的异同显得极为重要。在一种情境中适用的政策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情境,因此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具有宽广的视野,需要对各种教育情境中的语言政策做细致的比较研究。因此,这套关于东亚、欧洲、非洲、北美、拉美及中东语言政策的丛书对 LPP 领域的所有学者都将有借鉴意义。

沈骑教授主编的这套丛书也填补 LPP 研究的另一空白:世界范围内汉语区学者对语言教育政策相对匮乏的研究。随着中国训练有素的 LPP 学者日益增多以及中国对语言教育政策问题的日益重视,这套丛书将促进由中国学者实施的国际比较研究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教育。

詹姆斯·托尔夫森
华盛顿大学 教授

出版前言

在全球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浪潮之下,人类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沟通和理解,人们更渴望平等地交流与对话,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至关重要!我国正在从“本土型”向“国际型”国家转型,语言教育面临着更为重要的历史担当和变革发展的战略任务,规划合理、定位科学的语言教育战略能使语言在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促进和谐的语言生活,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环顾世界,母语能力的维护和提高、民族语言的传承和复兴,乃至国家和全民外语能力的提升,都给各国各地区的语言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面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和安全问题的语言教育战略研究正当其时。

语言教育战略研究是语言战略与语言规划研究的新方向。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关注社会中的语言功能、使用和传播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在国外悄然兴起。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关研究都没有关注语言教育领域,直到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库珀在《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1989)一书中首次提出“语言教育规划”或“语言习得规划”这一概念,才使得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真正接了语言教育的“地气”。库珀在评论了12种有关语言规划的定义后,提出自己的“第十三个”定义,即“语言规划是旨在通过语言符号的习得、结构和功能分配而

影响他人行为的一种长期细致的努力(和追求)”。这一定义实际上奠定了语言教育规划和政策研究的重要学术地位。传统语言政策偏于宏观规划,而语言教育研究则侧重教学实践的微观层面,两者难以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交集,为此,国外语言教育规划研究倡导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领域之间的衔接性研究。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母语、外语和民族语言都存在语言使用和教学方面的实践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教学方法或是课程设置问题,而是语言政策问题,涉及政策制定、实施、评价和调整环节,更牵涉到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大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语言教育战略发展主要呈现出四大特征:第一,经济全球化助推国际通用语教育。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等客观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作为一种全球性语言,已伸展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坊间有一条备受争议的悖论:要参与国际化进程,就必须使用英语,而推动英语传播的力量就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客观上,以国际通用语为主体的语言教育成为促进和提升本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发达国家如日本与韩国注重实用主义,先后提出英语教育战略计划,将英语作为国际文化交流和输出的工具;在欧洲,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北欧国家也积极推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教育变革;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印度也以国际化作为语言教育战略变革的重要动因,关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教育的质量和效率问题。

第二,非传统安全风险激发“关键语言”教育。所谓关键语言,是一个相对概念,是语言问题“安全化”和“战略化”研究的产物,是不同国家确定一部分语种(如非通用语种)作为其外语教育的关键发展,以满足国家的特殊需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举措。美

国在9·11事件后,将外语教育政策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形成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语言教育战略研究体系。同样地,中国在实施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过程中,亟需重视和提升国家外语能力,加强非通用语种外语教育已成当务之急。

第三,文化多元化倡导语言教育生态战略。在国际理解教育和跨文化教育思潮影响下,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语言教育政策研究近年来逐步兴起。以欧盟为例,为促进欧盟一体化进程,推进《里斯本条约》的既定目标,欧盟语言教育政策基本定位在“倡导多元文化多语学习、塑造国际公民”这一理念之上。欧洲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多语多元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从语言教育政策定位、制定和规划,语言教育政策与教学,语言政策与公民教育等多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为《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的最终出台创造了理论条件和实践基础。基于语言生态发展和平衡,倡导语言生态发展理论,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和双语教育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

第四,政治多极化催生语言传播和推广的竞争。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关系发展逐步形成多极化发展态势,不少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众多的新兴发展中大国,都从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高度,警惕语言领域的英语霸权主义和语言帝国主义问题,纷纷制定语言传播战略,向国际推广本国语言,借助网络信息化技术,在世界各地推进语言国际教育,形成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态势。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强国,理应从战略高度全盘考虑汉语国际教育战略问题,因此,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到捍卫国家政治利益,语言推广和传播战略都是当前和今后语言教育战略的重要领域之一。

“语言教育政策战略研究系列”丛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国际比较和本土实践两个维度探索语言教育战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构建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国际比较方面,基于多语种的详实扎细致的描述、调查、分析和阐释,本系列丛书不仅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教育战略的全貌,而且注重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教育政策问题的分析和探究,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重要的现实参考和决策依据。在本土实践维度,本系列丛书立足国家利益,深入调查国家外语能力、外语战略价值、国家双语教育以及母语教育等重要现实问题,力图从实证科学角度阐释语言教育对于国家转型、社会发展以及教育改革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开放书系,本丛书汇聚了一批格高志远、心怀家国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首开语言教育战略研究之先河,引领中国语言教育政策区域与国别研究之先风,希冀能够推动国内语言教育战略研究的蓬勃发展。自本丛书课题正式启动以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将其列为中心主攻方向之一,校内外专兼职研究人员一直鼎力相助;在国际方面,本丛书在选题、设计和研究过程中都得到国际著名语言政策研究专家詹姆斯·托尔夫森教授的关心和指导,教授在百忙之余,还为本丛书写了序言;同时,该课题得到国家语委重点项目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项目的经费支持,复旦大学出版社唐敏编辑欣然同意出版这套丛书,在此一并致谢!

沈 骑

2015 年立夏

序言：英语全球化语境下的 我国英汉双语教学

本世纪伊始出现的英汉双语教学热潮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各方反应之强烈,已经远远超出外语界。它不仅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一件盛事,而且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团体的视线。举个例子来说,由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百科辞书《语言与教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是国际上公认的语言教育领域里的权威工具书。在该辞书第一版(1997年出版,总主编为David Corson)的双语教育卷里,有关中国大陆的只有一篇汉语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介绍性文章。时隔10年,也就是2006年,该辞书第二版问世(David Corson于2001年去世,由Nancy Hornberger任总主编),我有幸应邀为其双语教育卷撰写我国英汉双语教育文章^①。由此可见,本世纪我国推行的英汉双语教育已经汇入国际双语教育洪流里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于1988—1996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高等教育研究所攻读博士期间开始接触双语教育的理念,并对加拿大浸入式双

^① 参见 L. Yu (2008),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nd edition) (Nancy H. Hornberger as the General Editor, Volume 5 Bilingual Education of Jim Cummins and Nancy H. Hornberger as the Volume Editors, pp. 175 - 190),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LLC.

语教育发生了兴趣。没有想到回国不久,国内也搞起英汉双语教育。我开始探讨如何从加拿大双语教育模式中汲取成功经验,建立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英汉双语教育模式。当今双语教育权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Jim Cummins 在为拙著《双语教育论——加拿大浸入式教育对我国高校双语教育的启示》^①所作序言中这样写道:“无数次研究反复证明,‘第二语言作为媒介的教学能够^②提高第二语言水平而且不会影响学生的第一语言水平或学科知识的掌握’。”我认为,Cummins 教授的这句话是他数十年从事双语教育的生涯的最为重要的总结,点明了双语教育的三个核心问题:学生的第二语言水平应该得到大幅度提高;学生第一语言的发展没有受到阻碍;学生的学科知识学习没有受到损害。经受几十年风雨洗礼的加拿大法语浸入式双语教育在这三个问题上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加拿大双语教育的经验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传播和积极推广。Cummins 从认知角度解释了双语教育为什么有这三大优势。在他看来,双语者的语言好比是露出水面的冰山,尽管双语者的语言互不相同,但“冰山”下的认知机制只有一个,双语者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学习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就是 Cummins 的著名的共同潜在能力(the 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假设。它不仅是加拿大浸入式双语教育的理论基础,也是世界各地推行双语教育的指导思想。我和我的研究生十多年所从事的研究同样证明,在我国高校中,只要英汉双语教育的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其中最为主要的条件是合格的师资和学生英语水平满足进入双语课堂的要求),学

① 参见:俞理明等,《双语教育论——加拿大浸入式教育对我国高校双语教育的启示》,J. Cummins 序,第 1—5 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

② 斜体为原文所有。

生的学科知识可以和用汉语授课的常规课堂学生学得一样的好，而前者的英语水平可以大大超过常规班的学生。此外，双语教育还可以改造传统大学英语的为语言而语言的教学模式，从而为大学英语改革开辟新的道路。我和我的研究生近 10 来年所做的研究以及我们外语界同仁们的其他许多研究无不证明 Cummins 的共同潜在能力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高校的英汉双语教育实践，尽管中国和加拿大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国情。

回首往事，我们看到这场双语教学热潮的原动力来自于我国 2001 年 9 月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这一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教育部明确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并在现行的高校本科教育评估中，把双语教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这一文件发布至今，一转眼 15 年已经过去。那么英汉双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如何？其成效如何？我国外语类杂志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综述性文章，但我个人认为，要全面完整总结这 10 来年英汉教育的成果和不足，几千字的论文是无法做到的。朱晔博士的专著全景式展现了我国英汉双语教育从本世纪初至今所走过的历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进行总结，深刻揭示我国英汉双语教育的内涵，并对双语教育愿景规划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毫无疑问，本书将会是我们外语领域工作者，特别是双语教育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而英汉双语教学不仅涉及外语教育，还涉及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甚至可以说还涉及我国改革开放这一根本国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对所有教育工作者，甚至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都很有参考价值。

但是，英汉双语教学从其推行之日开始，就遭到质疑和反对，甚至到今天，对教育部这个决策的不同声音也时有所闻。外语界

照理应该对双语教育的引进起带头作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我个人观察,外语期刊刊登双语教育的文章并不多见,也没有形成学术热点,甚至不在外语教学的主流研究之内。更令人大惑不解的,外语界对英汉双语教育质疑甚者公开反对的大有人在。记得有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说:“高校专业课连用我们自己本国语都难以讲得清楚,难道用英语可以讲得更清楚吗?”言外之意当然很清楚:英汉双语教育此路不通,高校搞英汉双语教学是常识性的错误。这位前辈的学识和对我国外语事业的卓越贡献国内很少有人及其项背,虽然我和这位前辈在双语教育问题上意见相左,但这丝毫不减本人对他的敬意。我举此例子,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外语界对英汉双语教育误区之多、误解之深。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借朱晔博士专著出版之际,对双语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等问题多要点篇幅阐述,以期减少误会,消除阻力。

一般认为,近代汉外双语教学发端于京师同文馆,迄今已有150年以上的历史。而根据有关的考证,双语教学在我国还可以追溯到汉、唐,甚至更久远,这也就是说有2 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当今欧美学者也指出,西方的双语教育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同样有2 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双语现象产生于人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际活动,双语教育是伴随双语现象而产生的。但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里,双语教育长期得不到重视,得不到发展。历代封建帝王以天之骄子傲视四海,外来民族在他们眼里,都是些未开化的“蛮夷”之辈,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去认真学习了。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里的一则故事令人深思。故事说的是在唐玄宗后期,国势颓衰,周边一个国家公然不把大唐帝国放在眼里,提交的国书使用的不是汉语,而是自己民族文字,并要唐王朝限期对此国书作出答复。唐玄宗看到满朝

文武百官无一能识此外族文字，又急又气，正百般无奈时，幸好有李白通晓这门语言，用对方的文字答复了对方的国书，挽救了“天朝”的面面。虽然这篇小说的主题在于颂扬大诗人李白的刚正不阿的品格，但对于今天的语言研究和语言教育还是有非常宝贵的启示的。唐玄宗所以连自己爱妃杨贵妃面子也不顾，责令自己的小舅子为李白磨墨，就是因为他找不到像李白那样的懂得外语的人才。由此看见，外语人才是多么重要。当然，《警世通言》里所描述的这场外交风波可能是虚构的，但小说所折射出来的唯我独尊、唯我独大的封建王朝的思维定式是个不争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思维定式，历代封建王朝基本奉行拒外来语言文化于国门之外的闭关自守政策。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国门后，满清王朝为保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才办起洋务运动。建京师同文馆，引进外来文化和科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和腐败的满清王朝不同，新中国大力发展外语教育事业，为的是让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了世纪之交，我们的政府更是把国民的外语水平看成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开展的双语教育和晚清的双语教育从政治目标到教育规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新中国建立到上世纪末这半个世纪里，包括英语在内的外国语还只是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外语教学仅仅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而双语教育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①。双语教育和外语教学不同，它不搞纯语言教学，而是主张依托课程内容来教语言，通过思想文化交流来学语言。这种教育理

^① 当然，当时国内办了各种级别的外语学校，这些学校也是使用外语来教授学科知识，有的学者还主张外语教学一条龙，这类似于加拿大浸入式教学的模式。但那时办学规范很小，教学理念很模糊，离严格意义的双语教育还相差甚远。